

泰戈尔与“东方学”

黎跃进, 荆红艳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关键词:泰戈尔;东方学;东方精神;奠基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9)01-0064-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9.01.007

Tagore and “Orientalism”

LI Yue-jin, JING Hong-yan

(Faculty of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Orientalism, as a discipline, originated in the modern We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Eastern intellectual elite based on their own traditions, formed “Orientalism” tha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standpoint. Tagore is the founder of the “Orientalism” in the East. 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having a great impact on the West. He is the cultural symbol for the West to understand the East. He was a thinker and poet with an overall orient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e has his own thoughts on many subjects of Orientalism, and has a specific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orient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realistic oriental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He founded the “Visva Bhara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s the Oriental Research Center and personnel training base,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successors of Eastern traditions and researchers.

Key words: Tagore; Orientalism; Oriental spirit; Founder

收稿日期:2018-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泰戈尔与20世纪中国文学”(14BWW022)

作者简介:黎跃进,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荆红艳,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东方学”作为研究东方历史、现实文化的学科群,产生于近代的西方,是在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的世界格局中和东方学者缺席的背景下产生,自然带上西方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此,爱德华·萨义德等学者对产生于西方的“东方学”做出了系统的清理和反思。

19世纪以来,东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作为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全球扩散压力的回应,开始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睁眼看世界。在民族救亡的现实使命驱动下,一批民族精英审视民族传统,在东西方关系整体的世界格局中探寻东方文化复兴和现代转型的可能性与路向。20世纪初,具有自觉东方意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学”在东方产生。泰戈尔是其重要的奠基人。

一、东方首获“诺奖”的文化象征

1913年,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东方作家,而且是此后半个多世纪唯一获此奖项的东方作家。将这一现象摆在20世纪世界格局和东西方关系中看,无疑是一个文化象征:泰戈尔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的代表,泰戈尔成为西方世界发现东方、认识东方的一个符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获奖前后,在西方世界引起的“泰戈尔热”得到说明。

1912年春,泰戈尔计划去英国旅行,但出发前病了。他到风光宜人的帕德玛河畔什拉依德赫养病,在那里尝试将自己的孟加拉文诗作译成英语。泰戈尔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形:“微风吹拂着我的身心,从那里迸发出悦耳的音乐,然而我又没有力量和决心,坐下来写任何新的东西。因此,我捡起《吉檀迦利》的诗歌,一首一首翻译,聊以自慰”^{[1]259}。五月里泰戈尔恢复了健康,践约英国之行,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航行中,继续翻译《吉檀迦利》。到伦敦后,泰戈尔将译稿交给英国画家、文学爱好者威廉·罗森斯坦(William Rothenstein),罗森斯坦和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朋友读到诗作都非常兴奋,为诗歌的清新优美、深邃睿智和东方式的神秘色彩所打动,他们的共同感受是“看来一位伟大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英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对泰戈尔的诗作也极为推崇。罗森斯坦邀请英美的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在府邸举行泰戈尔诗歌朗诵会,由叶芝担任主诵。参加者都被泰戈尔的诗歌艺术所折服。英国著名女诗人、小说家梅·辛克莱(May Sinclair)在朗诵会后写信给泰戈尔:“不管我是否能再次听到那些优美诗歌的朗诵,而那些诗歌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诗具有绝对的美——诗的完美,而且还因为它们把我只是偶然瞥见,往往在痛苦和令人捉摸不定的感觉下才能见到的神圣东西变成了现实。你用如此尽善尽美的东西(即在英语或其他西欧语言已无望见到的那些优美的东西)丰富了明澈的英语”^{[1]266}。英美意象派领袖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说得更直接:“大约一个月以前,当我去叶芝先生那儿时,发现他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当我向泰戈尔先生告别时,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总之,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感情,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中、在城市的喧嚣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漩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1]267-268}。

在罗森斯坦、叶芝和庞德等人的努力下,1912年11月伦敦印度学会出版了泰戈尔的英文版诗集《吉檀迦利》,叶芝为它作序。叶芝在序中写道:“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见到我是如何激动。我的印度朋友指出,这些诗的原文充满着优美的旋律,柔和的色彩和新颖的韵律。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1]264}。

英文版《吉檀迦利》出版后,引起西方文坛的震动。随后,泰戈尔自己英译的诗集《新月集》《园丁集》和剧本《齐德拉》相继在英国出版,由别人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孟加拉生活管窥》和剧本《邮局》也在英国出版或演出。虽然西方世界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亚洲诗人缺乏了解,对他的诗创作价值也不乏

质疑的声音,但文坛和主流媒体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英国的《时代文学增刊》载文认为:“我们读了这些诗歌后感到,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心灵的珍品,而且它们也是一个缪斯的预言:如果我们的诗人能够达到情感与思想如此水乳交融的程度,这类诗在英国也是能够被写出来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宗教和哲学分离,它说明我们在这两者间没有获得成功”^{[1]276}。

1912年底和1913年初,泰戈尔去美国旅行,会见了美国文学艺术界、思想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参加了宗教自由大会,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机构作了系列演讲,向西方世界介绍印度和谐统一的传统宗教哲学思想,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诗学、美学观念,将“泰戈尔热”从欧洲带到大洋彼岸。正是英美之行激发的“泰戈尔热”,为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获奖后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进一步升级。

印度学者克里巴拉尼在《泰戈尔传》中叙述当时西方的“泰戈尔热”时写道:“他在各地受到了盛大的奇迹般的欢迎。这种欢迎把罗宾德拉纳特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偶像——曾被西方忽视的亚洲人性潜在觉醒的象征。罗宾德拉纳特是第一个把它的清晰印记,铭刻在西方睿智人士心上的诗人——眼前发生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亚洲的‘心灵’是活生生的,它绝不是像博物馆里展览的标本,而应列入有生命的形象中去”^{[1]284}。泰戈尔本人对于瑞典文学院将奖项授予东方人的他,其文化象征意义也有清楚的认识。他1916年在美国演讲时说:“当诺贝尔奖从瑞典授予我时……作为个人价值的认可,它无疑对我很珍贵;然而,这还是一种承认,东方为文化的共同储备贡献它的财富时是西方各大洲的一名合作者,这是当代的主要意义。它意味着,大洋两边人类世界的两大领域像同志般地携起手来了”^[2]。

泰戈尔以其富于东方特色的创作,以他深邃的东方智慧,以他宁静、纯真、优雅的人格魅力,向西方诠释了东方精神,为一战前夕喧嚣混乱的西方世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无形中,泰戈尔不是用理论形态,而是以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的方式在建构“东方学”。

二、东方整体意识与弘扬东方精神

泰戈尔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东方整体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把复兴东方文化、促进人类文化和谐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以东方各国的团结合作,携手共进,甚至人类(包括西方)爱与和谐为目标。

(一) 近现代“东方”是命运共同体

泰戈尔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近现代的世界史就是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的历史,东方各国处于同样的历史命运中。东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滞后,面临着生存危机,泰戈尔访华演讲中说“亚洲曾经将世界从蒙昧中拯救出来。然而,黑暗却来临了,我不知道到底为何。当我们因为敲门声而从迷梦中惊醒时,我们并没有准备好面对强大而充满智慧的骄傲的欧洲。西方人来了,并没有给予我们它们最好的东西,也没有帮助我们寻求我们最好的东西,而是来剥削我们的物质财富。他们甚至闯入我们的家中掠夺我们。欧洲就是如此征服亚洲的”^{[3]50}。

泰戈尔充分认识东方残酷严峻的现实,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加剧了东方社会的危机。东方不可能依赖西方获得发展,因为西方不是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东方,理解东西之间的差异。声称“人人平等”的欧洲文明来到东方,东方民众期待着“平等”。“但这时候,高尚的教师却合上他们的圣经说:东西方的不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欧洲没有怀着尊重东方的感情,耐心地去设法理解这一差异,因为他们自恃有实力”^{[4]127-128}。面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和不平等关系,东方遭遇一样,是命运共同体。

东方怎样才能摆脱危机、得到拯救?出路在东方自身,应从东方传统中发掘资源,重塑东方“自我”,树立文化自信。泰戈尔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东方民众必须从迷梦中醒来,东方不应该向西方乞求,

而是从自身传统中寻求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将其发扬光大,这样,东方才能得到救赎,甚至用东方的精神文明去拯救全人类。不能寄希望于西方,东方需要找到与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二) 东方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既然东方社会是命运共同体,东方各国、各民族就应该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在人类文化现代转型中让东方依然霞光万道,旭日冉冉。1924年访华时,泰戈尔在演讲中号召亚洲团结起来:“在亚洲,我们要获得力量,就必须团结,必须对正义抱持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这种团结并不是通过某种机械的组织方法,而是通过一种真正的同情心”^{[3]47}。

泰戈尔不仅从现实层面强调东方各国团结合作的意义,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待东方文化“团结合作”的传统和本质。泰戈尔曾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满怀深情地回忆:历史上随着佛教的传播,当时整个亚洲,从缅甸到日本都用友谊的纽带同印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在慈悲和爱的诉求中的自然纽带。人们不用互相害怕,不必为了互相提防而束缚自己;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自私自利、互相探究和勾心斗角的关系,而是敞开心胸交流思想和理想,互相馈赠崇高的爱的礼物;不会因为语言和风俗的不同而妨碍人们相互之间的心灵沟通,没有种族高尚与卑下的区别,文学艺术在佛光普照下开花结果。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历史的种族,相聚在崇高的人类团结和亲密的爱的原则之中,彼此紧密联系。

这种历史传统的回顾,目的在唤起东方各民族的整体意识。古代东方传统是定居农耕文明,这种文明形态注重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彼此合作,在互信互敬中携手发展。

(三) 不遗余力传播、弘扬东方文化

泰戈尔以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东方文化,弘扬东方精神。他多次到东南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和东亚的日本、中国以及欧洲和美洲访问游历,一方面实地考察研究东方文化和艺术,一方面为传播东方文化,推动东方复兴而奔走呼号。在各地的演讲中,泰戈尔经常将东方和西方文化加以对比,“搜刮和剥削,使西方道德沦丧。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藉此为战。我们东方人从不敬仰与死亡打交道的将军,也不敬仰巧舌如簧的外交家,我们只敬重精神领袖”^[5]。泰戈尔虽然不否定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接受西方思想的某些要素,但必须看到,他是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上理解西方,将西方文化纳入东方轨道,是以东化西。

印度学者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认为:“他是重新发现印度同远东及东南亚国家古已有之的联系的第一人,他第一个指出印度必须将眼光从欧洲转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在信函、回忆录里,他描绘了他对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访问,这些访问就是为了提醒人们理解亚洲文化的统一性”^[6]。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倡导复活东方精神文化,目的在于唤起西方殖民统治下,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自豪。

三、“东方学”相关课题的思考

泰戈尔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他对东方主要传统的哲学、宗教、社会制度、文学艺术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对历史上东方各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东方文化作为差异性整体的存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

(一) 东方文化精神实质的精辟论述

泰戈尔认为,印度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人类关系的文明,是调整相互间义务的文化。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精神生活。它的准则是合作不是竞争。他认为,我们东方人的主要特点是,不过分看重通过占有优势而获得成功,却高度评价通过实现自己的“达摩”,即理想而获得的自我实现。他论述东方艺术的

特点：“东方艺术的伟大与瑰丽，特别是在日本与中国，就在于，在那里艺术家看到了事物的灵魂，并且相信它。西方可能相信人的灵魂，然而它并不相信宇宙有一个灵魂。这是东方的信仰。东方对人类的全部精神贡献都充满了这一观念。……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宇宙灵魂，我们东方人知道，真、力、美，在于朴素——在朴素之中，宇宙灵魂才显豁易见，事物才不妨碍内在的视力”^[7]。

泰戈尔的东方论述，往往是在与西方的参照中认识东方的整体性。泰戈尔强调东西方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他认为，西方世界把目光主要对准外部力量的领域，倾向于视域的开阔，试图放弃内心深处的终极王国。而东方民族与之相反，注重内在自省，明心见性，倾向于思想的深邃。

1904年英国殖民当局计划分割孟加拉国，引起印度抗议。泰戈尔在抗议活动中有一篇题为《本国社会》的演讲，演讲中对比印度（东方的代表）和英国（西方的代表）：印度看重的是人与人密切联系的社会和社会自治，英国看重的是用规约管理的政府和权力运作；印度传统是通过欢乐的宗教节日、庙会来运转社会，英国是以政府官员、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说到底，亲密关系和利害关系是东西文化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区别。泰戈尔强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向是印度长期以来的主要努力。……我们不论同谁有着现实的关系，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属。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把别人当作是完成自己工作有用的机器或这机器的一部分。这一点好坏两方面都会有，但这是我们本国的传统——不只是印度的，它是整个东方的传统”^[8]。正是基于对东方文化精神的这种理解，直到25年后的1929年，在题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东方性”的概念。“‘东方性’何在？其东方性在于接受了双方中间的亲切关系”^[9]。当年殖民政府在德里设置宫廷议会，泰戈尔极力反对。因为在他看来，宫廷会议是东方的传统，建立在彼此亲密的关系基础上，而模仿西方的议会，殖民官员是“用大刀的力量联系起来的关系”，以相似的形式包裹不同的实质，只会危害社会。

泰戈尔有着诗人的敏锐，加上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开阔视野，使他在观察审视东方文化时，也看到东方传统中闭塞保守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容易迷信权威和自我人格的迷失。“在我们东方，每个人都坐在强大自然的脚下，觉得自己无能而渺小。所以，一旦伟人出现，就把他推到人类之外，给予他神的地位”^[10]。这位权威人物说的每句话，都成为信条，不越雷池一步，否则视为大逆不道。

（二）东西互补的文化建设策略

泰戈尔从世界为“一”的哲学观念出发，强调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泰戈尔先后写过《东方与西方》《东方和西方》《论东方和西方》几篇标题近似的文章或讲演辞，其基本主题就是从东西方现实关系出发，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寻求双方彼此的互补与融合，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泰戈尔对东西文化差异有过很多论述。他认为西方关注的重点是世界的外部，以功利原则和科技手段谋求物质财富，追求个体的舒适享乐和价值实现；东方关注的重点是人的内在精神，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和谐、亲情友爱。面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泰戈尔表现出文化人类学家的开放视野，他用诗意的语言写道：“我们要打开长期以来一直紧闭的窗户，让外面的风吹进来，让东方或西方的阳光照进来。腐朽的习俗污染了我们室内的空气，或者阻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思想的电光照射进去，焚烧其中的糟粕，使剩余的部分得到新生”^{[11]233}。“我能断定，如果伟大的文化之光在欧洲熄灭，我们东方的地平线将在黑暗中感到痛心”^{[12]250}。

如何实现东西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泰戈尔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我们植根于古老的典籍，为了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我们应当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另一种是“借助骤然而至的外来文化的力量，我们像点燃的爆竹一样，瞬息之间离开了印度大地，飞到遥远发达的星球上去”^{[11]233}。前者是固守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后者是民族虚无、盲目崇信外来文化的西化倾向。泰戈尔认为两者都不可取，而应该是确立真正的民族自我，在立足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元素，与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加以整合，给民族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既弘扬传统，又革新传统，推动民族

文化发展繁荣。

对于保守倾向的故步自封,担心吸收西方文化会导致传统的破坏,泰戈尔的回答是:第一,西方文化已经来到了东方,在猛烈地撞击东方古老的传统,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只知道按祖训行事,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恪守祖辈传下来的信仰和习俗,拒绝接受现代文明,就会落后于时代,走向灭亡;第二,西方与东方的碰撞,是东方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是“现代最有意义的事实”,“是一次人类的重要接触”^{[12]250},只要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牢牢地扎根于东方大地,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在我们四周像雨水一样降落,河水一般流淌,我们不得不接受。时不时响起一两声惊雷,不但会下雨,而且有时落下冰雹,可我们怎能躲避得了!此外我们还应明白,雨季的一场新雨,正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大地中养育着新生命”^{[11]233}。

对于盲目崇信西方文化的西化倾向,泰戈尔从印度传统哲学的角度做出分析。印度哲学认为冲突亦是联合的一个层面。印度教经典、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十首王罗波那与天神作对,最终得到解脱。其寓意表明:栽倒在真理面前,才会深刻地理解真理。如果毫无冲突,没有歧见,毫不怀疑,十分轻易地接受了真理,这个真理不会得到人们的充分尊重。科学理论都是在怀疑,经过极其艰苦的实验,最终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我们曾经盲目地崇拜欧洲,惟欧洲是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可能真正学到东西的。……凡是别人送上门的东西,我们是不能真正得到它的”^{[13]147}。外来的文化,只有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选择性地吸收,不能全盘拿来照单全收。“欧洲有它的过去。因此欧洲的力量蕴藏在它的历史当中。我们在印度必须下定决心,不能抄袭别人的历史,如果我们窒息自己的历史,那将是自杀。在你剽窃不属于你的生命的东西时,这些东西只会毁坏你的生命”^{[14]56}。

作为东西文化融合互补的成功范例,泰戈尔特别推崇印度近代的几位杰出人物:启蒙思想家拉姆莫亨·罗易(Ram Mohan Roy)、南方学者拉纳德、哲学家辩喜(Swami Vivekananda)、作家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泰戈尔赞赏他们的共同特点:“在现代印度,凡是充分展现人的高尚情操,善于创造新世纪的人,他们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博大胸怀,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东西方互相对立的迹象,东西方之间地结合在他们当中得到充分体现”^{[13]146}。

(三) 质疑西方的“东方学”

“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近代西方。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殖民统治东方的历史。因而西方的东方学,难以避免当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20世纪后期,以萨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东方学”做出反思性批判,认为“东方学”是西方“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20世纪后期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5]。也就是说,西方的“东方学”成为西方出于自身需要而言说东方的一种方式,一些殖民官员、诗人、作家、学者表述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泰戈尔在20世纪上半期大量接触与“东方学”相关的人员及其著述,从东方的立场质疑他们对东方的描述与分析。

写于1901年的《社会差别》,是泰戈尔回应英国传教士迪龙牧师写的一篇名为《中国虎与欧洲羊》的文章。迪龙在文章中指责中国人攻击基督教传教士。泰戈尔明确表明:这是欧洲对亚洲的偏见,“欧洲一向为自己的所谓与人为善的文明感到自豪,总是千方百计地贬低亚洲……亚洲人的禀性总的来说是严酷、残忍和冷漠的,在欧洲社会,这就像格言一般留在人们的印象中”^{[4]127}。在文中泰戈尔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士攻击中国的信仰,而中国不是依靠武器来管理,是依靠信仰准则来管理的,在中国无论君主和朝代如何更替,社会的各阶层都遵循着社会信仰的准则。所以当信仰准则遭到攻击时,整个国家都会起来反抗。西方漠视东方文化,以自己的社会模式理解东方,难免各种偏见和成见。泰戈尔呼吁:应该承认东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平等地互相尊重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冲突和攻击,实现真正的文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文明人应当无所不知,了解所有的人,与所有的人交流并与他们打成一片”^{[4]132}。

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演讲中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功利性和贪婪性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也谈到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评议。西方有论者认为东方社会的理想是强调内在修炼、追求静态和谐,因而往往漠视外部事物,缺乏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泰戈尔认为,这些论者只是看到肤浅的表面现象,并没有真正理解东方社会和文化,“对一个西方观察家来说,我们的文明似乎全是形而上学,就像对一个聋人来说,弹钢琴看来只是单纯的手指运动而不是音乐。他不能想象,我们已经找到某种深厚的实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各种制度”^{[14]33}。泰戈尔形象地论证:什么是前进?火车呼啸着高速奔向目的地,这当然是前进,但一棵树的生长,没有火车的轰轰烈烈,而是生命内部的前进,它扎根土壤吸收养分,伸展枝叶化合阳光,这才是真正的生命运动。火车呢?有生命吗?它只是人为的机械,只是便利人的生活的工具。泰戈尔这里用作比喻的快速火车和参天大树,大概可以作为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的象征符号。

四、“国际大学”:东方研究的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使之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这无疑是泰戈尔对“东方学”的卓越贡献。

1920年泰戈尔出游美国时,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拜见了,两人就东、西文化展开讨论,其中谈到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打算:

我们亚洲文明,可分为两派,东亚中国、印度、日本为一派,西亚波斯,亚拉伯等为一派,今但说东亚。中国印度的哲学,虽不无小异,而大同之处很多。西洋文明,所以盛者,因为他的势力,是集中的。试到伦敦巴黎一看,西洋文明全体,可以一目了然;即美国哈佛大学,也有此气象。我们东方诸国,却如一盘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团结,所以东方文明,一天衰败一天了。我此次来美就是想募款,建一大学,把东方文明,聚在一处来研究。什么该存,什么该废,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研究。来决定;不可听西人模糊影响的话^[1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几个关节点和逻辑思路:第一,东方(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整一性不同,呈多元状态,东亚和西亚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第二,近代以来东方文化之所以“衰败”,就是各文化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封闭自己;第三,因而非常必要创办一所大学,将整个东方文明“聚在一处来研究”,打破各自的壁垒,增进互识;第四,在东方文化的研究中,应立足于东方自身的立场和视角,继承批判,不能盲目听信西方的说法。

就在为创办“国际大学”募集款项的美国之行,泰戈尔做了一次题为《一所东方大学》的演讲,对创办大学的背景、宗旨、办学理念与思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创办大学的背景,一方面是“亚洲的觉醒”,一方面是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中形成的居高临下态势,“两半球之间长期疏远引起的消沉作用影响人类的情绪使之更卑劣——一方是骄傲、贪婪、虚伪,另一方是惧怕、多疑、阿谀奉承——这种消沉作用一直发展,并向我们预示会有世界性的精神上的不幸”^{[17]280}。因此必须有一个平台,让西方了解东方,让东方充分展示自己,以求东、西世界的平等对话、交流与合作。但在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合作之前,东方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整合性研究,摸清家底,确立起真正的自我。只有这样,东方才能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自信,才会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会妄自菲薄,不至盲目地崇拜西方,鹦鹉学舌地人云亦云,以东方文化的特色,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作为促进东西方之间互相了解最佳的方法之一,在印度开始创办一所国际大学。根据我心里的计划,这所大学将邀请西方的大学生在合适的环境中学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不同体系,鼓励他们与已从事这一任务的学者们合作,继续研究……我的愿望是单纯地在业务上渐渐扩大这所大学的范围,直到它包括东方文化的全部领域——雅利安语族、闪语族、蒙古语族等等。其目的是向全世界显示东方精神”^{[17]281-282}。

国际大学的创办和教育实践,体现了泰戈尔的教育理念。首先是自由发展和探索真理的教育思想。在讲演中他谈到自己的希望:“它将帮助印度有才智的人全神贯注于工作,并充分明白自己;自由地探索真理,不论在哪里发现真理,就要使它成为他们自己的,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评价,表达他们自己的创作天才,并把他们的知识给予世界各地前来的客人”^{[17]285}。泰戈尔还特别强调,“将不断追求真理作为它的目标”,学校不是禁锢个性的死气沉沉的囚笼,而是让充满活力的师生一起,在快乐中追求真理、传授真理,在愉悦中接受真理、弘扬真理。

其次,泰戈尔推崇印度古代传统的静修林教育模式,反对从西方传来的机械教条,缺乏生气与创造力的应试教育。他曾不无诗意地描绘印度古代的森林学校,“在印度,森林学校像莲花一样怒放,在日光星辉的清静天空下绚丽多彩。印度的气候常常邀请人们到露天去;她的巨川大江的奔流声是庄严的赞歌;她无限宽广的平原以超世的寂寞围绕我们的家园;在那儿,太阳从绿色大地的边际升起,像是那看不见的供奉者送给未知的供品,黄昏时它降落到西方,又像是自然向永恒敬礼的华美礼仪”^[18]。因而泰戈尔注重教育中的自然启悟与自然感化,追求灵魂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他提出:“大学决不能成为收集和散布知识的缺乏独创性的机构”^{[17]284}。为了让学生充分接触自然,国际大学的教室就是一个自然园林,青天是顶,绿树是墙,小黑板挂在树上,教师、学生各自带上一块毛毯,盘腿围坐成圆弧,或者辩论,或者诵读,读书声鸟鸣声相互应和。

当时国际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长谭云山对国际大学的记述,印证了泰戈尔的办学宗旨和思路。国际大学分为研究院、大学部、学校部三大部。研究院的学习没有固定的科目与年限,哲学、文学、艺术、佛学、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各种学术文字等,根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加以选择,选择某一领域的专家合作研究,在研究中增长知识和生命体悟;也可以根据时间和精力,同时进行几个领域的研究,自由灵活地安排。同学相互兼任教授,如中国学生初学梵文,则由印度同学教;学习之外,中国学生兼教中文。大学部分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两年。其科目均为三种:(1)随意研究不考试科目,初级设有文明史、普通艺术、普通科学等;高级设有文化史、近代思想、普通文学与艺术等。(2)必修考试科目,初级设有梵文、孟加拉文或其他印度文字、英文、伦理、数理等;高级设有任一种语言文学、印度古代文化、印度哲学与宗教、普通哲学、普通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3)选修科目,设有希腊文、拉丁文、印度方言等,各科目都有专任教授。学校部是基础教育,分初、高两部,相当于中学的初、高中教育程度。此外,还有女子部和实业部。女生平时上课与男生一样,这里专为女生练习女工、家政并可以住宿,还有为女生举行的种种游艺与集会,她们比之男生更加快乐。实业部距圣地尼克坦一里半,主要目的是帮助附近村民解决实际问题,内设织工,木工,种植,养鸡,饲蚕等,也是国际大学师生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基地。

这样的部类建制、科目设置和教学方式,确实落实了国际大学“向全世界显示东方精神”的办学宗旨。而且学生和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在国际大学任教的有来自西方的东方学家,东方一些国家的学者。法国东方学家西尔万·列维、德国东方学家莫利兹·温特尼兹、俄国东方学家L·鲍格达诺夫、爱尔兰学者亚瑟·盖迪斯、美国学者斯坦利·琼斯和格莱琴·格林、犹太裔学者S·法劳姆等都曾在国际大学任教。

人才培养方面,以中国为例,不少东方学家是在国际大学的培养和熏陶中从事东方研究,如:谭云山、曾圣提、金克木、徐梵澄、吴晓铃、常任侠等;印度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如印度的中国学学者克提·漠亨·沈、师觉月(P·C·Bagchi)等。也培养了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这样的杰出人才。

总之,泰戈尔把成立于1922年的国际大学当作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也是体现泰戈尔人类走向“共同体”的具体象征。泰戈尔曾有诗句:“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这正是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①理想的诗意表达。

^①关于“国际大学”的情况,详参谭云山:《印度周游记》,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版,第198-202页。

五、结 语

泰戈尔的“东方观”有几个特点:(1)他是诗人,他的许多表述是诗性的,往往带上情感化和理想化的色彩;(2)有意识将东西方进行比较,在互为参照中认识东方精神的独特性和价值;(3)强调东方文化中内在在精神、人伦道德的普遍意义;(4)对东方文化发展的未来充满自信和乐观。泰戈尔的“东方观”对当代东方学的发展和完善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虽然泰戈尔没有专门论述“东方学”的著作,甚至没有提到“东方学”这个概念,但在他的文学创作、游记、演讲和论文中有大量关于东方历史、社会、文化描述、阐释和探讨,从而为“东方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 泰戈尔传[M]. 倪培耕,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 [2] 泰戈尔. 诗人的宗教[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1卷. 白开元,殷洪元,耿克璞,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52.
- [3] 泰戈尔. 泰戈尔对中国说[M]. 徐志摩,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13.
- [4] 泰戈尔. 社会差别[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3卷. 白开元,殷洪元,潘小珠,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5] 泰戈尔. 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M]// 秦悦. 泰戈尔:我的前世是中国人.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43.
- [6] 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 泰戈尔评传[M]. 刘文哲,何文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3-4.
- [7] 泰戈尔. 艺术是什么[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2卷. 倪培耕,陈宗荣,李德山,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65.
- [8] 泰戈尔. 本国社会[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3卷. 白开元,殷洪元,潘小珠,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3-84.
- [9] 泰戈尔. 泰戈尔的政治思想[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4卷. 殷洪元,白开元,李德山,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23.
- [10] 泰戈尔. 东方社会[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3卷. 白开元,殷洪元,潘小珠,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9.
- [11] 泰戈尔. 论东方和西方[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3卷. 白开元,殷洪元,潘小珠,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12] 泰戈尔. 东方与西方[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1卷. 白开元,殷洪元,耿克璞,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13] 泰戈尔. 东方和西方[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3卷. 白开元,殷洪元,潘小珠,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14] 泰戈尔. 民族主义[M]. 谭仁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5]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4.
- [16] 冯友兰.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M]// 孙宜学. 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106.
- [17] 泰戈尔. 一所东方大学[M]// 泰戈尔. 泰戈尔全集:第21卷. 白开元,殷洪元,耿克璞,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18] 泰戈尔.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泰戈尔讲演集[M]. 康绍邦,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39-140.

